



职业教育与 社会发展研究

钱民辉 著

中国教育科学
博士后文库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钱民群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年·哈尔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钱民辉著.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6

ISBN 7-5316-3528-3

I. 职… II. 钱… III. 技术教育-研究 IV. G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501 号

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ZHIYE JIAOYU YU SHEHUI FAZHAN YANJIU

钱民辉 著

责任编辑:王晓明 刘剑刚

封面设计:陈冬妮 安玉滨

责任校对:董淑丽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3.25·字数 300 千

1999 年 6 月第 1 版·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200

ISBN 7-5316-3528-3/G·2706 定价:22.00 元

《中国教育科学博士后文库》

总 序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崭新时代。科教兴国,教育为本。高质量发展教育事业已经成为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的最大共识。教育要发展,科研要先行。因此,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是国家科教兴国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矢志推动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进展,向社会郑重推出《中国教育科学博士后文库》。这是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盛举。

博士后制度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是进一步培养学术性研究人才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国的博士后制度起步于 80 年代初期,是国家引进和进一步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的重要战略措施。这一制度建立伊始就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从 1994 年北京师范大学建立我国第一个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以来,至 1999 年,我国已经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了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加上教育学相关专业,如心理学博士后流动站等,博士后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国家科教兴国事业的发展,我国教育学博士后事业必将在 21 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博士后事业不仅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需要包

ABC94/06

括出版社在内的全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本文库的出版,对于推进教育学的博士后研究和整个国家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有关专家的热忱关注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组织了文库的编委会,对有关选题进行了认真的、细致的论证。我们认为,本文库具有如下特色:

1. 高质量的作者队伍。进入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年轻人都经过严格的选拔,他们立志从事教育科研,专业知识储备充足,科研素养优良,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他们年富力强,科研处于最佳状态。

2. 高水平的研究选题。本文库所选基本上都是教育学博士后研究课题的成果。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博士后选题多为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学术上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严格和开放的运作程序。本文库编委会由教育科学各领域的资深专家组成。大家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对提出申请的博士后研究成果进行严格的评审,以保证书稿的质量。

文库选题将涵盖教育科学的所有领域,同时,本文库将一直向所有教育学博士后开放,保证高质量的教育学博士后研究成果不断进入本文库。

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出版一套作者队伍强、学术质量高的教育科学精品图书,以展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为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中国教育科学博士后文库编委会

1999年5月

序 言

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富强,最最重要的资本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的提高与开发则要依靠教育。综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无不把国民教育放在各项事业之先。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资金、技术,需要建工厂、修公路、修水库,但更重要的是培养高素质、有能力的人,否则资金可能会浪费,技术得不到利用更谈不到创新,工厂、公路、水库的管理上不去会导致亏损,成为包袱。真正有远见的政府投资,应当是投给学校和各种教育事业。当前中国人力资源素质的现状远远落后于各项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制约了资金设备的有效利用,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创建,也制约了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

正因为看到了当前我国教育事业的现状是制约现代化事业的瓶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1992年至1994年期间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育学院合作组织了“中国教育的区域性发展”专项课题,在全国6省24县开展了基层教育事业发展现状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准备在北京大学发展“教育社会学”这个专业方向。从这个计划出发,1996年至1998年期间,我们吸收了在华东师范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钱民辉到我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中国教育的区域性发展”课题组部分课题成果

的写作工作,同时以职业教育为专题开展了独立的对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本书即是钱民辉在他的博士后研究出站报告基础上完成的。

当时我们建议钱民辉以职业教育为他的博士后研究的选题,主要的考虑是在6省24县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对各地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现状有了一个大致地了解,为了拓展研究领域,应当把目光转向城市。城市教育可大致分为3个部分:中小学教育(包括幼儿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包括成人教育)。从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和城镇就业状况来看,职业教育是基础弱、经验少、需求大、发展快的一个领域。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少年和下岗分流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是城镇社会就业的一个大问题,解决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使他们学习到就业所必需的实用性知识和技能,尽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由于钱民辉博士长期在上海学习,对上海的情况比较了解,上海又是我国大城市中产业重组和人员再就业做得比较好的地区,职业教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建议他以上海作为实地调查职业教育的地点。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科教育、职业教育事业都十分发达,职业学校与社会用人单位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及时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来调整专业方向、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并为毕业生的就业建立了一定的渠道。这些方面,都十分值得我国的职业教育机构借鉴。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安排钱民辉博士赴香港进行职业教育的考察,希望他能够从香港职业教育的实践经验中拓展思路,进行比较研究。

本书回顾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之后又在两个层次对职业教育进行分析,首先把中国的职业教育与一些国家(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作了比较,然后对中国的大城市、中小城市、

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进行了比较,这些比较研究帮助我们从差异中看到问题。同时,本书以中国社会整体性发展作为宏观大背景来考察分析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教育社会学的特殊视角。教育学往往容易就教育谈教育,就学校研究学校。而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的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脱离了对社会及其变迁的整体性认识,脱离了对社会中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分析,是无法对学校的教育功能进行全面和客观的评价的。本书的后三章特别体现出作者对劳动力市场的关注,相信对于读者是会有所启发的。

钱民辉博士在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后,已经留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任教,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同时参加了由我所组织的关于高等院校体制改革研究的课题组。我国高等院校的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是教育社会学专业应当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北京大学正面临着在管理体制上的全面改革,包括人事聘任制度、后勤管理体制、教学与科研管理体制等等都将在今后几年里进行变革,如何借鉴历史上和国外大学在管理体制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如何使大学适应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把北京大学建设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教育社会学研究应当为实现这一任务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希望今后全国能够有更多的人关心我国农村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事业,参与或支持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在 21 世纪得到更快的发展。

马 戎

1999 年 2 月 10 日

北京大学蔚秀园

前 言

职业教育发展的程度和职业教育普及的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大批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人才,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后备力量。无数发展事实都证明,现代社会的任何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和教育。而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和普及,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职业教育的发展。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职业教育,早已成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强大力量。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认为职业教育是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由于我们正经历一场“知识和科技革命”,未来世界最重要的竞争,将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首先是培养大批科技型劳动者的职业教育的竞争。

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势必要受到社会经济各种因素及其规律的制约与影响。本书首先从历史的角度,集中探讨了职业教育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那些早期职业教育思想家的职业教育思想,曾经在历史上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就是在今天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教育,使我们能

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摸索到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点和趋势。

其次,从跨文化的研究角度出发,分析了别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与特点。研究中显示:最初的职业技术学校教育诞生在欧洲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法国在1786年建立了孟德纽成工艺学校。英国在1798年在诺丁汉堡办起以训练纺织女工为主的学校,并于1823年建立了伦敦技工学校。美国1851年在费城也建立了第一所职业学校——春园学校。我国也在1866年建立了最早的职业学校即福建船政学堂及艺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19世纪70年代,人类进入电力时代,电力的应用并非直接来源于生产,而来自于科学研究的成果。18世纪的许多科学成果均在这一时期转化为生产力,这种科学指导生产的形式,促使职业技术学校教育得以迅速发展。同时在此期间许多工业发达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法律手段来加快职业和技术教育的发展,如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颁布的强迫职业补习教育法、1894年日本公布的国家津贴职业教育法、1917年美国实施的史密斯—休斯法都对推动当时职业技术学校教育起了巨大作用。这期间职业技术学校教育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学历层次上都有很大发展和提高。由于注重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以,这些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保证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这些国家职业教育特有的发展模式给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可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另外,本书着重探讨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对我国劳动力资源与就业形势、城乡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做了专题研究。从职业教育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与结果来看,区域社会经济状况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因素。其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 职业教育体系的产生本身就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历史发展的结果。

2. 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经费和职位,决定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经济发展的快慢,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起伏跌宕的历史就能够证明。另外,从本书研究的部分县市和上海的社会经济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关系来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3. 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制约了职业教育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横向的门类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层次结构的变化,又决定了职业教育纵向的程度结构和人才规格知识结构的要求。

从我国广大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进程来看,科技进步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迅速改变着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在城市,许多旧的职业消失,新的职业不断涌现;在农村,传统的农业生产形式和手段已经逐渐消失了,科技型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正在迅速崛起。但是,农村职业教育现在却并不能适应这一形势,我们研究的城乡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缓慢,并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科技已经在影响和改变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但是,作为推广和传播科技的职业教育并没有及时地将新的科学技术纳入到现有的专业和课程结构之中,也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这种职业教育无法培养出当地急需的科技人才。另外,作为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并不是真正面向农村,而是想通过职业教育找到工作,脱离农村。从这几年的毕业生工作情况来看,大部分农业人才转行,无几人务农。在这几年各种职业都出现严重超员的时候,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无法安置就业,结果造成了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萎缩。

进一步的分析还显示:由于城里的就业职位和一些能坚持到今天的乡镇企业已人满为患了,新的就业职位提供不足,所以农村

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有关人士统计,到2000年以后将有3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如何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培训实现顺利转业,这种形势对农村职业教育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农村职业教育又无力应付这种挑战,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能就业(根本不具备就业能力)又不能升学,于是,人们就叫它“失业教育”。这种职业教育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了,农民谁还会送子女上职业学校?这种“正规”的职业教育在农村已经是奄奄一息,但非正规的职业教育如科技培训却开始火爆起来。在“星火计划”推动下,农民掀起了学习科技热,把这种以科技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教育纳入了农村共同体(communitiy)中,这种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职业教育无疑是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条出路。它不但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能使农民致富。农民有饭吃了,就开始讲贡献了,黄炎培等人制定的职业教育宗旨不就实现了吗?但是,与这种现象相反的是隶属于二级教育的职业学校还在农村地区苦苦支撑着,由于不能解决“吃饭”问题,落得个门庭冷落不说,县乡政府和民众还要支付维持它的经费。这种职业中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从我国现代城市的发展来看,职业教育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缓解了升入高中和大学的压力,分流了60%至70%的学生;二是培养出大批的技术工人,在推动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上功不可没。众所周知,70年代以来,上海的工商业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水平,上海的产品最过硬,上海的经济负担着全国1/6的税收任务,用上海人的话来说,这应归功于上海有一个完备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能够培养出一流的技术工人。如今,上海的产业结构又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知识经济提前在上海登陆。由于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传统产业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形势了,使得原来的技术工人纷纷下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如潮般地流向上海,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一开张就将低学历者(大专以下)或无学历的技术人才拒之门外,同时,为高学历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前景。当然,他们深知中国的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占适龄上大学群体的3.5%),就是对这些精英全敞开大门,也恐怕难以网罗全。于是有人说道:上海如此之大的劳动力市场(据说有五大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人力市场、劳务市场、职业介绍所、保姆市场,现在又出现了媒体市场和网络市场),却是大肚子小嘴巴,是为大学毕业生生的。从现在的任何一家市场来看,都要求学历。能提供好职位的也就是“好饭碗”的是人才市场,这个市场对职业教育是关闭的,除非是高等职业教育,但上海的高等职业教育却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个中原因颇为复杂。

原来,隶属于二级教育的职业教育都是与企事业单位联办的,学生基本都能解决就业问题,但是现在,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大部分的联办单位都解约了,职业教育直接面向了劳动力市场。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即使能找到工作,也很难做到“人事相适”,大部分人都学非所用,从事非技术性的工作占多数。如果不再学习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是3年或者5年以后的下岗人员,难怪职业学校的学生都说:“我们是吃青春饭的。”调查中我们还发现,有许多职中学生一边上职中,一边还上着复高,由于精力分散,绝大多数的人结果大学没考上,专业技术也没学好。在上海没有一技之长的职校生是不能解决就业问题的。

从二级教育中的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职业教育永远是被动地迎合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从劳动力市场获得最新信息后,起码需1年时间才能做出反应,包括专业、课程、师资、设备等的调整,用2年至3年的时间将“产品”推向市场,其实已经过时了。用人单位的技术变化或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职业教育与用人单位基本是分离的,两者很难合拍,这就使职业教育不

能解决人的“吃饭”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能为城市经济发展增进生产能力?我认为,应将二级教育中的职业教育交给大企业或联合企业去办,即纳入产业共同体中,建立企业内终身教育训练体系,以引进人才为副,开发企业内人力资源为主。实践证明,用创办正规学校的方式进行这样的培训是昂贵的。通常情况下,在职业学校培训1名技术工人,就意味着4名至5名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将丧失享受普通教育的机会。再说,职业教育缺乏合格的教师,对市场专业技术的需求是难以预测的,而大型的公共联营企业或私人企业里则有能力较理想地承担这种培训。

考察我国劳动力资源与就业形势时会发现,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过大,新生劳动力增长加速,呈高峰期,再加上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动等原因,就构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就业困境。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业,城市同样有越来越多的人员下岗。据官方统计,我国目前共有下岗人员1000万左右。这一数据是全国总工会在对16个省市的统计与推算中得出的。另,劳动部信息中心曾有一项统计说:1994年底在1.1亿国有企业职工中,富裕职工总数约3000万(其中公开闲置与隐性闲置各1500万),占全部职工人数的28%,而且下岗仍在继续。目前,政府和社会都在关心着下岗人员,也为下岗人员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积极为下岗人员的生活和再就业创造条件。据悉,目前全国工会组织已开办职业介绍机构300多家,成功地介绍下岗职工再就业20万人次。同时,建立工会职业培训机构1300余个,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34000余次,培训职工100多万人。各地工会积极开辟各种就业渠道,计划1997年将累计为50万企业富裕职工和20万企业职工提供再就业机会,争取对100万职工实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转岗培训。但是,从现在的效果来看这些措施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因为职业变革的速率远远超过了职业培训的速率,经由基础教育

和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不论是从观念、行为方面,还是从知识、技能方面都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变化。但是,当人们谈及下岗的原因时,更多的人对单位进行优化组合不满意,正如有的人说:优化组合是关系组合,是近亲组合,是裙带组合,这些微词尽管多少带有个人偏见,但有些单位却也确实如此。然而,真正引起人员下岗的根本原因远不止这些,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各大产业部门由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型的趋势,是我们的教育与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技术人员的新的要求。如果我们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不进行彻底的改革,那么,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就业人员的速率是以算术级在增长,而下岗人员的速率是以几何级的速率递增,一方面是大批人员失业,另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紧缺。这不是危言耸听,许多国家已经出现过或正在出现这一事实。我们现在应当做的事是:从我国当前的就业与再就业的问题所引起的更为广泛的、持续的社会问题与趋势中,认真地反思培养广大中初级劳动者的职业技术教育如何能适应变革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职业技术教育能否成为人们就业与再就业的最佳选择、终身职业教育与持续性的培训是否可行等问题。

在思考这些问题之前,笔者曾两次到上海进行实地考察,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调查地点,是因为上海这几年由于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一百多万的下岗人员(据说现在已安置了80万人的再就业)。职业教育与转岗、转业培训似乎也开始火爆起来。然而,时隔不久,当一批经过正规职校的毕业生和经过下岗培训的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才知道,能找到一个所学能所用的工作毕竟不容易。而真正火爆的还是高等教育。在上海,本科以上学历的市场状况是求大于供,大专以下学历的是供大于求。调查中还发现,上海就业机会之多是出乎人们预料的,而职业周期之短也是出

乎人们所料的。许多新兴的职业令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求职者和下岗人员望而却步,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成交额并不尽人意,有的单位几年都没有招到一个理想之人。“短、频、快、高”的职业特点越来越突出,想找一个长期固定的工作几近于零。面对这种就业现状,职业教育却还在迟缓地适应这一职业变革的趋势,还在继续培养着未来的下岗人员。“长工为本,短工为末”、“国营为本,个体为末”、“洋工为本,土工为末”的求职观念还在上海人脑中做祟,人们选择职业教育恰恰也是这一观念的驱动,而职业教育的改革究竟为迎合人们的需要还是市场变化的需要,这种两难的选择使上海职业教育的改革更加放慢了脚步,1997年又有许多的联办单位与职业学校纷纷脱钩,这无疑是给上海职业教育雪上加霜。从全国来看,那些曾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出大量的中初级劳动者的职业学校,现在也都面临危机。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由于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并不能脱离普通教育的影响,人们投资于职业教育得不到预期的回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因此生源日趋短缺。大批的在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学生开始涌入大中城市,形成今日的民工潮。在上海火车站和一些民用建筑工地,我询问了几十位民工,他们没有一个人接受过职业教育,二十几岁的人大都只具有初中程度。问及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时,大部分人对此不理解,只有几个人对接受职业教育能不能找到固定工作感兴趣。

最近,国家公布了劳动体制改革的决定,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律要经过1年至3年的职业培训方可就业。而且,国家为了发展职业教育特地提出并于1996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这些政府行为无疑有助于各地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是,如何去发展却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应从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中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中去研究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从就业与再就业的趋势中探索职

业教育新的生长点,特别是如何在企业共同体中或农村生产共同体中建立终身职业教育机构,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如此等等。这将成为我们在当前与今后一段时间内着重探讨的问题。

钱民群

1999年2月18日于北京